



Zhongguo Renkou
Laolinghua Beijing xia de
Caizheng Zhengce Yanjiu

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 财政政策研究

李保仁 白彦锋 王凯 著



本书获得财经应用型人才项目资助

Zhongguo Renkou
Laolinghua Beijing xia de
Caizheng Zhengce Yanjiu

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 财政政策研究

李保仁 白彦峰 王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研究 / 李保仁, 白彦锋, 王凯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 - 7 - 5141 - 8169 - 2

I. ①中… II. ①李… ②白… ③王… III. ①人口老龄化 - 研究 -
中国 ②财政政策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24. 24 ②F812.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9271 号

责任编辑: 凌 敏 张 萌

责任校对: 魏立娜

责任印制: 李 鹏

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研究

李保仁 白彦锋 王 凯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 010 - 88191343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lingmin@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5.25 印张 260000 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169 - 2 定价: 4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com.cn)

序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生育水平下降、人口寿命延长及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和不可逆转的趋势。自2000年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理论界就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21世纪，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个问题若不能得到有效应对，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财政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影响。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单纯的人口政策调整是不太可能奏效的，更需要整合政府公共资源、推动综合的政策改革，并在政府主导下使市场各个行为主体能够合谋合力、多元共治。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本书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以财政政策变革为主线索和突破口，探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路径。

在理论上，对于人口老龄化、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这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均存在着相互影响。在现实情况中，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其人口老龄化水平目前也非常高。那么，发达国家是如何通过财政政策变革处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政策是否达成了预期目标？我国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已逾十五年，人口老龄化、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同样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政府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又有何影响？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我国政府应如何通过财政政策变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能够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财政政策又该进行怎样的短期选择与长期抉择？

基于上述的基本事实和政策现状，首先，本书以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及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要论断出发，从研究财政政策入手来探求如何破解难题，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国际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财政政策变革的理论与实践；其次，本书对中国自进入老龄化社会十五年以来政府财政政策的变革历程进行详细的梳理，并利用计量模型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本书在明确政策变革的基础依据（短期、长期）及政策目标之后，再分析了财政政策变革（短期选择、长期抉择）的路径和机制，力图通过促进人口老龄化、政府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协同创新，使政府能够有效履行公共治理职能，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能够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

在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之后，本书的政策建议部分包括：第一，促进老龄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应立足于一个基础依据——养老模式的选择（短期内，居家养老模式仍是主导；长期看，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是必然）。第二，财政政策的短期选择是：财政助力激发“银发经济”潜力；财政支出规模应做到适度供给、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财政收入应规范形式，推进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改革；提高税收优惠幅度，力促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第三，财政政策的长期抉择是：构建以社会保障税与遗产和赠与税为主体的老龄化税制框架。第四，增强政府执行力，是财政政策变革的最重要保障。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有两点：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指导思想出发，立足政府公共治理的角度，从研究财政政策入手探求如何破解人口老龄化难题。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为政策目标，提出了短期与长期相结合、合谋合力与多元共治的改革建议。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综合运用人口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限于中国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断续性以及相关统计口径的调整差异较大，本书未能从全国层面对研究主题所涉及的三个主要因素进行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第二，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本书仅仅从效率方面研究了人口老龄化与政府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相应的政策匹配，未能就人口老龄化及财政政策所可能带来的代内之间和代际之间的不公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感谢王凯博士的导师李保仁教授的指导，本书的出版凝聚着导师大量的心血。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乔路、周红、董雨浦、陈珊珊、苏璐璐、陈彪、明钱等为本书的修改完善做出了大量工作，一并表示感谢。本书获得了国家社

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雾霾成因及财政综合治理问题研究（15AZZ010）》和“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的资助，为其阶段性成果。本书获得财经应用型人才项目资助。

白彦锋 王凯

2017年6月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研究背景	(3)
1.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14)
1.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研究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17)
第2章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研究的文献综述	(19)
2.1 人口转变理论	(19)
2.2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21)
2.3 人口老龄化与政府财政	(22)
2.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政策	(26)
2.5 人口老龄化的文献评述	(28)
第3章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30)
3.1 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口老龄化	(30)
3.2 人力资本理论与人口老龄化	(37)
3.3 公共产品理论与人口老龄化	(43)
3.4 公共财政理论与人口老龄化	(49)
第4章 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现状	(54)
4.1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分析	(54)
4.2 中国财政体制现状	(64)
4.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现状	(83)

第5章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	(87)
5.1 西方国家的经验借鉴	(87)
5.2 东亚国家的经验借鉴	(95)
5.3 拉美国家的经验借鉴	(100)
5.4 国际经验的启示	(103)
第6章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105)
6.1 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	(105)
6.2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检验	(108)
6.3 研究结论与政策意义	(121)
第7章 人口红利式微下的财政收支平衡研究	
——以东北地区为例	(123)
7.1 东北地区财政收支平衡研究背景	(123)
7.2 东北地区财政收支平衡研究意义	(127)
7.3 东北地区财政平衡状况	(127)
7.4 东北三省人口结构变化与人口红利情况	(136)
7.5 东北地区人口红利式微与财政收支的实证分析	(151)
7.6 基于人口角度促进东北地区财政平衡的对策建议	(162)
第8章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北京市基本养老金收支水平情况的影响	(168)
8.1 计划生育历史回顾	(169)
8.2 二孩政策对养老金影响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71)
8.3 影响分析的模型建立	(173)
8.4 影响分析的模型求解	(179)
8.5 模型的敏感性分析	(185)
8.6 实证分析的结论	(187)
8.7 政策评价和政策建议	(187)
第9章 促进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192)
9.1 基础依据与政策目标	(193)

9.2 新常态下激发“银发经济”潜力	(196)
9.3 财政政策的短期选择	(199)
9.4 财政政策的长期抉择	(207)
9.5 重要保障：提升政府执行力	(214)
第10章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216)
10.1 研究结论	(216)
10.2 研究局限和展望	(218)
参考文献	(220)

第1章 导论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较短的人均寿命，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年轻化水平。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寿命的延长及社会生育观念的不断转变，世界人口年龄结构也随之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陆续步入老龄化社会行列，如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社会老龄化水平的加快，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参与率降低以及社会储蓄率与消费率的结构改变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加之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大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复苏乏力、持续低迷的同时，高福利体系下福利支出的刚性增长，政府又难以在成本控制与激励导向间实现有效平衡，财政风险不断积聚和膨胀。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深受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困扰。

按照当前国际上关于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标准^①，我国0~14岁人口比重1990年已经达到老年型，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龄化指数等指标于2000年底全部撞线，这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转变，促使老龄化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必然面对的社会现实与共同挑战。“与人类历史上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化等经济与社会变革相比，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发展必将带来相对更为猛烈的冲击。”^②

^① 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标准为：0~14岁人口比重30%以下，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10%以上，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7%以上，老龄化指数30%以上。“人口老龄化指数”是指在同一个人口总体中，老年人口数（65岁及以上）与少儿人口数（0~14岁）的相对比值，指数越高说明老龄化程度越深。

^② Alan Pifer, Lydia Bronte. Introduction: Squaring the Pyramid, in Our Aging Society: Paradox and Promise [C].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3~4.

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然面对的难题之一，“基数大、增速高”“未富先老”与“未备先老”以及“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大”等特征更加显著，这也越来越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政策提及颇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工程，政策从实施到见效也有明显的滞后性，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应对老龄化的上述公共政策都不可能在短期内立显成效。

应当明确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而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进程；第二，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单单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重要的是牵涉社会整个群体的协调发展及社会福利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分配等方面；第四，应对人口老龄化，单凭人口政策调整是不可能、不现实的，这需要政府公共政策整合与综合改革，需要政府主导下市场各个行为主体的合谋合力与多元共治。

近年来，我国的各项改革普遍陷入“渐而不进”的局面、难以形成突破以及无法全面推进改革的困境。“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制度和政策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①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供给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工具，可以为政府职能履行、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财力保证。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实社会背景下，财政政策的实施与变革应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有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是财政政策实施与变革的目标之一，也是财政政策得以实施与变革的物质基础、前提条件；其二，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这是财政政策实施与变革的目标之二。因此，本书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抓住财政政策变革这一主线索和突破口，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现状梳理、国际借鉴、实证检验等途径，提出促进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在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① 胡志勇. 论中国“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及财税对策 [J]. 东南学术, 2012 (5): 34-35.

1.1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不单单是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对社会而言，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立足于并服务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首要前提和物质保障。对政府而言，应对人口老龄化则需立足于履行公共治理职能、兼顾财政自身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对个人而言，应对人口老龄化则需满足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与福利公平。三个目标应相互统一、协调发展。

1.1.1 国际背景：国际社会深受老龄化困扰

1.1.1.1 人口结构发展失衡，老龄化趋势加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现今也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随着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育观念的不断转变及人均寿命的延长，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也随之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并呈现不断加重之势。

据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①，早在 1950 年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 7% 达 7.9%，2010 年升至 15.9%。如表 1-1 所示，依据联合国中生育率水平方案预测，结果显示：世界上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从 2015 年的 8.25% 骤升至 2100 年的 21.89%，较发达地区的该比重将在此时期内从 17.47% 增加到 28.66%，欠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的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将急速增加。由此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引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任何国家或地区都难以逃避，只不过是时间上的早晚而已。

^①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B/OL]. <http://esa.un.org/wpp/Excel>Data/population.htm>.

表 1-1 2015~2100 年中生育率水平下世界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预测

单位: %

年份	地区分类					
	世界	较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最不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不含最不发达国家)	欠发达地区 (不含中国)
2015	8.25	17.47	6.33	3.56	6.84	5.34
2020	9.28	19.13	7.33	3.75	8.03	6.01
2025	10.32	20.83	8.33	4.03	9.23	6.86
2030	11.55	22.46	9.57	4.44	10.70	7.79
2035	12.79	23.64	10.90	4.91	12.30	8.73
2040	13.86	24.56	12.06	5.44	13.71	9.68
2045	14.64	25.17	12.93	6.07	14.74	10.71
2050	15.60	25.80	13.98	6.85	15.99	11.88
2055	16.77	26.37	15.29	7.63	17.57	13.00
2060	17.56	26.54	16.21	8.48	18.64	13.99
2065	18.02	26.38	16.79	9.39	19.25	14.87
2070	18.43	26.26	17.30	10.29	19.75	15.67
2075	18.95	26.44	17.89	11.16	20.36	16.45
2080	19.60	26.82	18.59	12.02	21.11	17.24
2085	20.23	27.29	19.25	12.87	21.80	17.98
2090	20.81	27.77	19.85	13.72	22.39	18.68
2095	21.35	28.21	20.42	14.58	22.91	19.35
2100	21.89	28.66	20.98	15.44	23.42	20.02

资料来源：根据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2 整理而得。

1.1.1.2 不断增加的养老成本支出加剧财政风险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但加之极低的人口增长率，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下降和社会消费、储蓄结构改变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在发达国家普遍较高的社会福利体系下，加之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政府所担负的医疗卫生支出、养老保障支出等急剧增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预测数据显示^①，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越发严重，老龄人口比重将由当前的 22% 增至 2050 年的 33%，届时将导致发达国家用于老龄人口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养老支出占其 GDP 的比重超过 10%。毋庸置疑，如此巨大的养老支出将给各国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预计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支出届时将占到 GDP 比重的 10% 甚至更多。雪上加霜的是，受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养老金计划资产大幅缩水。如此一来，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使得应对本已十分严峻的发达国家老龄化问题与养老金缺口问题显得更加迫在眉睫。为此，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或计划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甚至取消。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人口寿命在不断延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世界各国的财政风险。据 IMF 发布的 2012 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相关资料显示，当前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这一变化并未引起多数政府和养老金提供方的充分认识和足够重视；在 2050 年的人均寿命比当前延长三年的条件下，部分国家本已沉重的人口老龄化成本将提升 50%；人均寿命延长所带来的长寿风险将对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及其他社会风险构成严峻挑战。在人口老龄化与长寿风险不断积聚的情况下，政府应通过制定动态的延迟退休计划、提高养老金缴费比例及缩减社会福利支出额度等措施来有效应对。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已有大量发达国家的理论界与实务界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公共政策改革，来实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福利水平提高及财政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丰富的国际经验实践，可以为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变革提供重要参考。

1.1.2 国内背景：老龄化背景下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新常态”

1.1.2.1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数量及政策变迁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早的人口统计出现于东周庄王十三年，据当时人口调查统计活动“料民”显示^②，中国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先秦时期，各诸

^① 新浪网. 发达国家老龄化加速，拟延迟退休引发争议 [EB/OL]. <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5/042418155951.shtml>, 2009-07-05.

^② 中国古代人口政策的变迁 [EB/OL]. http://news.ifeng.com/a/20151105/46121179_0.shtml, 2015-11-05.

侯国出于强国、征战和称霸的需要，纷纷推出积极的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到秦始皇时，秦国进一步加强人口管理，开始要求男子登记年龄。西汉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提升及采取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国人口增长加速，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第一个生育高峰期。之后唐朝“安史之乱”使得人口急剧下降。中国古代第二个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现在北宋年间。清代人口剧增，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高峰期，从弘历当皇帝的乾隆年间开始，中国人口数量突飞猛进，有学者称之为“人口大爆炸”；清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古代人口最旺盛期，中国人口首破4亿人。学术界认为，清代人口剧增与清廷的人口政策有直接关系，如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口与赋税分开，不再像以往那样按成年人头收税，大大刺激了每个家庭的生育欲望。另外医疗水平的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种的增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少的时期是东汉末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全国仅0.25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大的时期是北宋末期，当时人口已超过1.2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40%。

1.1.2.2 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现实背景

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以“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率由1970年的2.60%下降到2014年的0.52%^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保持在1.5，即平均每个家庭生育1.5个小孩，这不仅远低于美国（2.1）和挪威（1.9）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印度（2.8）相比，则差距更大。以东北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仅比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城市略高，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超低出生率”。除了超低的生育率外，东北地区还面临严重的老龄化现象。以辽宁省为例，截至2013年，辽宁老年人口已达到789万人，占辽宁总人口的18.5%，而全国老年人口占比为14.9%。这使得东北城市面临着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阻碍。同时，经济的不景气也会加速人口外流，2015年一季度全国31个省（市、自治

^① 2014年之前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4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区) GDP 增速排名, 辽宁为 1.9%, 成为 GDP 增速最低的省份。黑龙江与吉林分别是 4.8%、5.8%, 分别列全国倒数第四、第五位。而 2015 年上半年全国 GDP 增速情况显示, 辽宁增速仅 2.6%, 依旧排名增速最低。黑龙江、吉林增速分别为 5.1% 和 6.1%, 分别位列全国的倒数第三、第四位。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东北三省总人口为 1 亿 995 万人, 对比之前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10 年间东北人口净流出 180 万人。因此, 部分学者提出, 中国有必要采取措施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1.8 左右的水平, 方可实现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的长期均衡和协调发展, 以避免老龄化速度急剧加快和未来人口总量的迅速下降(彭希哲, 2013)。

无独有偶, 按照国际公认的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标准, 1990 年, 我国 0~14 岁人口比重已经达到老年型; 2000 年底,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龄化指数等全部撞线, 这也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①, 我国 2014 年年末的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3755 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为 10.1%, 较 2013 年的 9.7% 增加 0.4 个百分点。另据联合国相关数据的预测^②, 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不断上升, 预计 2050 年将达到 23.92%, 2100 年将达到 28.19%。“发达国家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历经了上百年左右, 而中国则仅需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即使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 我国也是属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蔡昉和王美艳, 2006)。从刚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7% 的比重)发展到 14% 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我国大概仅需 27 年左右。然而, 发达国家却大多用了 45 年以上, 法国(130 年)、瑞典(85 年)、美国(79 年)等部分国家则用时更长。

整体而言, 在 21 世纪,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人口增速趋缓背景下的超速老龄化是当今中国人口变化的最突出特征。此外, 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呈现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地区差异大、城乡差异大以及性别差异大、高龄化等显著特点。当然, 更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数大”“增速快”。

1.1.2.3 经济增长“中国奇迹”后步入“新常态”

总体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

^① 国家统计局《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B/OL]. <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population.htm>.

覆地的变化，经济成就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年均 10% 左右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①，1978~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由 3645.22 亿元增加到 636463 亿元，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重要指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 GDP），2013 年蹿升至 6767 美元。此外，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居民的消费类型和消费结构也均发生了重大转变，这都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然而，具体来看，如表 1-2、图 1-1 所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自 2008 年后开始急剧下滑，2011 年跌破 10% 以后，近 3 年来一直在 7.50% 左右的水平徘徊。我国经济增长正告别高速增长时代，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同时，可能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新常态”将成为常态。

表 1-2 1994~2013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单位：%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94	452.8	363.3	13.09	11.82
1995	502.3	398.6	10.93	9.72
1996	552.6	433.9	10.01	8.86
1997	603.9	469.4	9.28	8.18
1998	651.2	501.4	7.83	6.82
1999	700.9	534.9	7.63	6.68
2000	759.9	575.5	8.42	7.59
2001	823.0	618.7	8.30	7.51
2002	897.8	670.4	9.09	8.36
2003	987.8	733.1	10.02	9.35
2004	1087.4	802.2	10.08	9.43
2005	1210.4	887.7	11.31	10.66
2006	1363.8	994.7	12.67	12.05
2007	1557.0	1129.6	14.17	13.56
2008	1707.0	1232.1	9.63	9.07

^① 1978~2012 年数据来自 1979~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